

社会转型期底层的命运迁徙和灵魂之痛

——评楚荷长篇小说《狗崽王三》

周 刍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 楚荷新作《狗崽王三》通过主人公狗崽王三的自叙,以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形式,讲述了当代中国一个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命运变迁和灵魂痛苦,体现出作者对转型时期沦为牺牲者的底层民众命运的真切同情和对他们未来出路的严肃思考,是楚荷进行底层叙事的又一成功之作。

[关键词] 楚荷;《狗崽王三》;底层文学;底层情怀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1-0037-04

On Fate Changing and Soul Paining of Under-Stratum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Comment on Chu He's Long Novel of Dog's Son Wangsan

ZHOU Chu

(School of Humanity,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Hun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Chu He's new novel of Dog's Son Wangsan, which focus on first person to narrate, tells a story of a normal Chinese worker and his family, shows the writer's fate changing and soul paining in social transition period. The novel reflects the writer's concern of the under-stratum people who was forced to become the victim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and surely regarded as another successful attempt in Chu He's root literature work.

Key words: Chu He; Dog's Son Wang San; the root literature; under-stratum caring

上世纪90年代,“打工文学”开始进入主流文学研究者的视野,紧接着,对“打工文学”的研究引发了新一轮对描写社会底层人生作品的研究。以2004年《天涯》杂志发起的“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专题讨论为标志,“底层文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目前学界对“底层”与“底层文学”的定义争论颇多,相对来说,刘旭的界定比较符合共识,得到广泛认可:“其主体构成实际上就是工人和农民,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政治上基本无行政权力,经济上一般仅能维持生存,至多保持‘温饱’;文化上受教育机会少,文化水平低,缺乏表达自己的能

力”。^[1]即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劳动者,是缺乏言说能力的沉默的大多数,需要一个智识更高的“他者”来帮助言说苦难和不公平。于是,非底层或已经脱离了底层的作家进行“底层文学”的创作被认为是作家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的体现。这样“底层”就不仅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当代有良知的作家自主追求的叙事对象。

继《苦楝树》和《工厂工会》相继在《当代》杂志上发表并广受好评之后,楚荷又沿着其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创作了个人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狗崽王

收稿日期: 2012-12-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研究”(11YJC751100)

作者简介: 周 刍(1989-),女,湖南衡阳人,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三》。这部作品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通过主人公狗崽王三对自己坎坷的40年人生经历的自叙,讲述了一个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成员在社会转型时期所经历的人生变故。小说充满着浓郁的底层情怀和作者对转型时期沦为牺牲者的一代普通民众未来出路的追问与思考。

一

对于“底层”文学的讨论,始终存在一个“知识分子能否为底层代言”的问题。知识分子与底层人民本身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是毋庸置疑的。在《天涯》杂志组织的“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讨论中,刘旭提出这样的观点:“底层是统治者的‘他者’,底层是没有话语能力的,他们只能‘被说’”;然而非底层人士或已经脱离底层的人士对底层的表述却“表述得再伟大也是一种扭曲,真正的他们仍然没有出现。”^[1]评论家们对当前底层文学的创作存在一种“表达的焦虑”,他们担心作为代言人的作家是否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有深入的了解和细致的考查,能否真正从底层民众的真实需求出发,还原他们生活现状,表达他们内心感受;作家们是否会利用他们手中的话语权,将对底层的表述作为一种工具,来表达他们某些先在的思想观念。部分底层文学作品似乎印证了这些担忧并非杞人忧天:有的作家对底层民众的描写仅仅是生存状况的展示,一描写底层就陷入了苦难叙事,比苦比狠;有的作家则以精英身份居高临下地批判底层人民的丑陋,认为他们的不幸是自己造成的。

关于如何表述底层的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南帆认为:“鲁迅为首的一批现代作家再度证明,许多作家的想象力不仅可以细致地复活底层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良知和文学才能时常敦促他们摆脱世俗势利之见的拘囿而投入底层。”^[2]他首先肯定了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的能力,并且提出,纯粹的底层经验仅仅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幻觉,在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对话中提炼和解读底层的诉求,想象底层人物的真实命运是一种很好的叙述方式。

《狗崽王三》以一种纯粹的底层经验的自我展示的面目出现,小说的叙述者并非知识分子,而是一个典型的底层人物,故事以人物的自述展开。作者的“代言”是一种彻底放弃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思维方式的“代言”。从人物的第一人称叙述语言

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极力避免知识分子式的指点江山的语气,而是潜入底层社会的自身存在中,设身处地体验底层人真正的感受,让叙述者的话语、认知、情感与其平凡的身份、知识水平相符,从而使底层经验以平视的视角呈现出纯粹自我展示的风范。正如王晓华提出的“无论如何,平视、介入、设身处地的写作才能造就出真正的底层叙述——指向底层、为了底层、呈现底层自身的文学。”^[3]

小说通篇都是来自底层的人们才能说出的朴实无华的话语,不论是狗崽所崇拜的父亲,还是狗崽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他们所有的智慧仿佛都来自古老的传统,他们往往在表达自己的见解之前,习惯以“老话说……”开头,仿佛古人的言论才是智慧的源泉,而他们自己的言论没有“老话”的支撑就无以取信于他人。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层次使他们不能准确地说出历史人物的名称,不能完全地理解社会变化的实质。因此小说中经常看到“有个了不起的人,叫什么来着,忘记了”“我听得半懂不懂,当然,更学不全”之类的明显表现出叙述者低下的文化水平的语言。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着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是非观,他们对人对事的评判通常只用对与错、美与丑、聪明与愚蠢等简单的词语,再进入深入一点的思考,叙述者狗崽就只能用“我偶尔想到一些高深的事儿,都只有天能够回答”这样的话来搪塞自己和读者。尽管在描述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渲染景物、氛围的时候,叙述者偶而会露出一些文人习气,但总的来说,在叙述者的语言上,我们看不出与底层大众的隔阂,仿佛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坐在你的面前,向你絮絮叨叨地讲述他的一生。这种用第一人称视角对人物的底层经验进行自我展示的代言方式,显示作者对底层民众的同情之真切。他不以知识分子为尊,而是将自己与底层民众放在同一平面,站在他们的背后诚实地为他们代言,以自己文字替没有话语权或者没有能力表述自己的底层人民发出真实的、诚恳的、有力的声音。

二

底层文学的兴起,“彰显出作家直面现实的道德良知”。^[4]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倾向,是体现作者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标志,不过在底层创作中存在着一些作者抢占道德制高点,而以书写底层为工具来宣扬自己的道德化的文学立场的倾向。洪治纲在《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

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作家们的主体精神里,非常明确地凸现出某种情感化的道德立场——同情大于体恤,怨愤大于省察,经验大于想象,简单的道德认同替代了丰富的生命思考。”^[5]在不少的底层文学作品中,确实存在这种通过表现苦难、悲哀与绝望去彰显作者的道德良知,仿佛笔下的人物越苦大愁深,越能表现作者的道德水平的现象。这种道德先行的创作动机,导致了以苦难叙事为噱头,只有概念化、类型化的受苦难底层人民形象而没有对人物灵魂的关切,只有对社会黑暗现象机械地罗列而没有对真实、鲜活的社会人生进行典型化处理的作品的出现。

从《狗崽王三》这部作品中,完全读不出创作主体对于道德立场的先在追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主人公王三立体、丰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形象刻画。这也正符合批评者对底层文学创作的期望:“作家们在书写底层民众的生活时,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创作主体的道德安抚,而应该深入到人物的精神内部,从艺术的丰富性上激活他们的生命质感。”^[5]

狗崽这个人物是以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在自我叙述中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由于叙述视角的限制,作者不便于在叙述中加入过多的主观感情与评价,但狗崽的形象却不依赖作者主观化的评点而存在。这个人物形象的丰富性体现在他让人不知不觉中从俯视到平视再到仰视,让人对他由轻蔑到认同再到欣赏甚至崇敬。一出场,狗崽是以低贱的形象示人:吮吸母狗的奶水长大,以狗为养母,因此一身“狗气”。他的认知与作为为普通人所不齿:读书时,他厌学贪睡;高考时,他骗取家里的报名费跑去摸鱼;挣钱时,又因贪图轻松而去卖假药。随着时间的推移,狗崽成长为一名国有企业的职工,并且爱上自己的工作,本本分分地诚实劳作。渐渐的,狗崽这个人物身上的大忠、大义、大爱和至孝慢慢地显现出来,让人不得不为他折服:得了“孝子”的虚名后,他真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孝子;为了心爱的女人,他可以舍弃一直追求的男人的骨气而悄悄地流泪;为了兄弟的义气,他可以挨打忍痛直到昏迷也一声不吭;为了正义的伸张,他敢于与恶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抗争。在狗崽平凡的自述中,渐渐生出一种小人物的英雄主义,其气势甚至不逊于关羽刮骨疗伤、荆柯只身刺秦,让人油然而生一股敬佩之意。他的身上融合贯穿着湘潭人的一种文化性格:霸蛮。狗崽多次提到湘潭的文化名人毛泽

东、曾国藩、彭德怀等,他们为他们自豪并以他们为榜样。同时,这样一位硬汉也有侠骨柔情,让人为之动容。狗崽这个形象是立体的、丰富的、生动的,作者并未对他进行刻意贬低和刻意拔高,也没有在人物身上寄予过多的道德诉求,而是还原生活的原貌,让这样一个底层人物站出来叙述自己,表现出作者对底层人物真正的同情和尊重。

同时,《狗崽王三》中体现出来的道德观也是朴素的、自然的,小说宏扬的是生长于民间传统的、植根于底层人民心目中的最普通也最广泛的道德标准。如对张叔玷污自己继女的行为以“吃屎”来形容,厌恶之感不言自明;对船主恶意欠薪的行径,狗崽和兄弟们都愿以命相搏,显示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朴素道德判断;对狗崽和张华卖假药挣钱的行为,狗崽和张华父母都很支持,因为在他们的道德观里,“自古以来,只有杀人放火做贼才犯法”。作者对于他所描写的人物,并没有站在启蒙者的高度,以道德上的优越感对人物做是非美丑的直接评价,也不对他们做道德崇拜式的拔高,而是以底层人物自己的语言呈现底层人物自己的逻辑,其道德评判真实与自然。

三

考察新世纪底层文学兴起的原因,孙培云认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构成底层文学兴起的宏大社会历史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讲,底层文学的出现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危机在文学中的反映。”^[4]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国家经济实力得到迅猛发展,但同时,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也使利益分配方式产生相应的调整,在一部分人成为市场经济弄潮儿的同时,另一部分人则被体制所抛弃,成为改革的牺牲者。社会分化日益加剧,“现代化”阵痛日益严重,新的底层逐渐形成,他们的痛苦与无奈引起了有良知的作家的关注,并为之著书立言。“底层文学”并非是新世纪以来才产生的一种文学形态,在分析了底层文学从白话文实行以来在中国社会中近百年的流脉之后,晏杰雄提出:“从文学流脉看,真正的底层叙述应是以社会变革为背景的底层文学。”^[6]因此,底层文学的内涵是丰厚的,范围是广阔的,它从未从现代白话文学中退场过。社会变革时期,会产生新的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因此也就会有相应的底层文学产生。

《狗崽王三》正是这样一部以社会重大改革为

背景的、反映在改革中沦为牺牲品的底层人民生活的小说。小说时代背景跨越40年,从3年大饥荒时期进行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再到改革开放与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在以宏大的历史背景为幕布的舞台上,历史与政治的宏大背景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暗中支配着那些小人物的命运。作者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变迁,让人们反思社会变革对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破坏力。文革时,人人批斗知识分子,学生从此不认真学习了,一代人的志向和前途被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消磨殆尽;改制后,国有企业日渐衰微,私营企业雄起,一代人在人到中年时被体制无情抛弃,生活困苦。与此同时,腐败兴起,有权有势的地头蛇仗着地方行政机构的保护,可以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害得他人家破人亡而自己却生活极尽奢靡。小说中所有的情节都是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出发,以人物命运的转折来反映社会的变化、时势的变迁。

宏观历史事件成了小说中人物命运转折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国有企业的纷纷垮台和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起,对狗崽一家、表姐一家、张花一家的影响的都是巨大的。原先风光的国营企业如船舶厂、毛纺厂、卵石厂纷纷衰落,以企业为家、以国有企业职工身份自豪的狗崽、张花、张华等人在极不情愿之中眼看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或是倒下或是被并购,国企职工只能感叹“以前是相信,昨天是希望,今天是失望,明天,肯定是绝望。”而他们最终也由衣食无忧的国企工人沦为社会保障对象、自负盈亏的小个体户或私营企业的打工者。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掀起了“下海”之风,原是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表姐夫妇也做起了船舶制造商。但由于黑心船主的拖欠工资,原本干劲十足、充满希望的工人们由于积怨而一时冲动,变成了杀人凶手;表姐家破人亡,狗崽则由于刺伤船主而锒铛入狱。

关怀大众、针砭时弊是中国文学从未中断的传统。《诗经》中的怨刺诗,杜甫的“三吏”“三别”,明清小说中的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五四新时期的启蒙文学、问题文学,革命时期的左翼文学,新中国的工农兵文学,新时期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再到新世纪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作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描写了中国社

会广大底层人民的生活,继承并发扬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追求,表达自己对时代的关注和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真正“为时而著”的作品,都是作家倾听时代的足音,把握时代的脉搏,用心去感悟时代的产物。楚荷的《狗崽王三》正是这样一部“为时而著”的作品,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底层人物的命运沉浮和灵魂之痛。

《狗崽王三》是楚荷进行底层叙事的又一成功之作。作品形式上没有过多的求新求异,作者对自己所观察到的社会百态进行了准确真实的记录,对笔下的人物倾注了深刻的同情。与五四文学一样,这样的底层文学也是为着表达作者对底层社会的关切和“引起疗救的注意”,然而作者却没有以道德的审判者自居,而是以内化了的底层平民视角平实地叙述社会众生百态。小说在展示底层社会真实状况的同时,也不忘对孕育出小说人物的社会环境进行本土化叙述。这体现在作品对湘潭本土的文化名人、方言土语、民风民俗、城市沿革和湘潭人独特个性的叙述上。鲁迅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本土化、民族化的底层叙述,为小说的底层叙述增添了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内涵,也体现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地域化、个性化、多样化的追求。

参考文献:

- [1] 刘旭. 底层能否摆脱被表述的命运[J]. 天涯, 2004(2).
- [2] 南帆. 曲折的突围——关于底层经验的表述[J]. 文学评论, 2006(4).
- [3] 王晓华. 当代文学如何表述底层? ——从底层写作的立场之争说起[J]. 文艺争鸣, 2006(4).
- [4] 孙培云. 试析新世纪“底层文学”兴起的原因及意义[J]. 时代文学, 2009(11).
- [5] 洪治纲. 底层写作仅仅体现了道德化的文学立场[J]. 探索与争鸣, 2008(5).
- [6] 晏杰雄, 孔会侠. 底层叙述的文学流脉和时代拓展[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1(3).

责任编辑:黄声波